韩东:白马王子是个军区司令员的儿子,真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意淫啊

蒋方舟:在我多年的观影史上,这是一部垫底之作,这恐怕是让国产电影倒退多少年了

刘仰:人类历史上著名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从来没有被冠以“变态”“邪恶”之类的帽子

表江:它不胳肢你,它也没拿人的生理痛苦硬来讨你的眼泪

《山楂树之恋》一场保卫处女的战争?

无论拍什么,商业也好,文艺也罢,大片也好,“小清新”也罢,张艺谋的每一部作品必然成为一个话题。《三枪拍案惊奇》的“讨伐”言犹在耳,《山楂树之恋》的“贩卖纯情”已山雨欲来。

作为一部改编自畅销书的电影,有人因为是原著迷,也想看看电影;有人因为对知青题材感兴趣,想去看看张艺谋怎么拍;有人反感原著,所以也不准备凑电影的热闹;有人则在观看过多部口碑不佳的张氏作品之后,想去领教一下烂作的下限。当然,也有人想借此缅怀一去不回的“纯爱”。不过,张艺谋倒是一贯的平常心,其实他就是碰到一个感兴趣的题材,然后去拍一个不同的故事而已。

□快报记者 陈曦

《山楂树之恋》的“纯爱”主题引发激辩

“代表了国产电影的退步”

9月12日,电影《山楂树之恋》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纯爱”作为电影主题,被片方反复提及。首映典礼上,作家蒋方舟、田原、李戡以及演员海清作为青年代表,李雪健、奚美娟、萨日娜等艺术家作为中年代表,与主创进行了一番对话式的调查问答。

《山楂树之恋》中,老三许下承诺,愿意等静秋一辈子。“你能为爱等一辈子吗?”当主持人抛出这个问题时,几位艺术家都不假思索地说:“我愿意。”而4个年轻人的答案也惊人一致:不愿意。“我没耐心,等不了那么久。”“我不想那么命苦,等别人一辈子。”“心里可以等一辈子,但实际上一年就差不多了。”蒋方舟更是语出惊人:“我的上限是等一年半。我认为,一年半是女人的一个周期,每过一年半,她的成色就差了一圈,市场抢手率和占有率就会下降,所以不能等一辈子。”蒋方舟的答案着实吓了李雪健一跳,他半天没回过神,说:“我真是开了眼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容我回去好好想想。”

蒋方舟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称,首映礼上的这番问答显得“用心险恶”。“(女人周期)‘一年半’那个是我胡诌的,我不知道正常的周期是多少。他的那个选项很傻嘛,他问你为爱能等多久,等一年还是等一辈子?我就觉得哪有那么非此即彼的答案,要么我就只能一年,要么我就一辈子死扛在那个地方,所有的选项都很极端,没有一个中间的选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用意还蛮险恶的。就是找几个50后、60后的老艺术家,然后再找四个80后、90后小孩,将两代人的爱情态度进行对比,目的就是为了说明现代年轻人的爱情观庸俗啊、堕落啊、开放啊。”

电影上映后,媒体不乏溢美之词,“纯爱秒杀老中青”“简单毫无雕饰”“大制作回归清新小品”……认为这是张艺谋电影创作上的另一种尝试。作为首批观影者,蒋方舟认为这部电影并无可取之处,“实际上这是一场名为《一场保护处女的战争》的电影。情节是这样的:由于时代对爱与性的封锁,个人前途至上的崇高目的,加之老三的天性醇美和及时去世,这场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看到最后,我都不想看老三和静秋的那张脸。”

蒋方舟认为,这部电影无论是立意还是表现手法都是影史上的一种退步。“用突破这个词很拔高了,我很多年没有看过国产电影了,我不知道跟他以往相比怎样,但在我多年的观影史上也是一部垫底之作。突破?这恐怕是让国产电影倒退多少年了。电影里有些手法我也不能接受。比如说有个镜头,弥留之际的老三快死了,我跟我妈讨论,上一次我们在电影里看到死人是多少年前了,好多年都没看过直接把死人放到镜头里了,这种很抽劣很落后的拍摄手法他又拿出来了。甚至包括,他(张艺谋)的追求那么简单,他的讨论也那么简单,对观众的期许弱智到了这种地步,我真的觉得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山楂树之恋》编剧之一顾小白回应说,“我们最早在一起讨论剧本的时候,是想突出‘那个特殊年代里性压抑’的主旨,但看片后发现,导演放弃了原先的方案,他没有跟我们说缘由。我想对于张艺谋来说,他可能只想做一个极致的爱情电影。这部电影呈现出的状态挺‘特殊’的,一部电影里只呈现出两个人的状态,艺术片中会有,但的确不多见。张艺谋这次可能想做一个极致的尝试吧。”

“最干净的也是最变态的”

电影《山楂树之恋》根据同名畅销书《山楂树之恋》改编。原书的宣传语“最干净的爱情”就曾引发过大讨论,而电影的宣传语“纯爱”的意思跟“干净”也差不多,禁欲和克制成为电影的一大卖点,甚至比原著做得更干净,原著中的女主角身材前挺后凸,脸蛋也是万人迷,电影里的静秋则青涩、可爱很多。原著中男女主角虽然没有发生性关系,但还是有不少和性有关的场面,凸显了那个时代的性压抑,但这些在电影中都大大削弱了。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有些人看过原著,还准备再看看电影,有些人出于对原著的反感,也不准备凑电影的热闹,而有些人则在经历过英雄、黄金甲、三枪的“洗礼”之后,抱着好奇的心理想看看张艺谋到底有多“烂”。

80后作家春树看过原作,她对这个故事的解读跟蒋方舟差不多,“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相爱,女的保守、提防,一直没有让男的得手,等到女的彻底信任那个男的准备献身给他时,男的却患白血病死了,挺可怜的。”

她还没看过电影,所以没法评价,但她的期望值并不高,“我就感觉不会是我喜欢的那种,因为张艺谋前面几部电影我都不喜欢,带着那种特别狭隘的观念,对女性贞洁的要求,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性的爱就是特别纯洁的呢?我就觉得特可笑。最干净的也是最变态的,对人性的压抑与扭曲,居然可以被用来赞美了!”

她觉得那些宣传语暴露出来的却是隐藏其后的某些人的心态与嘴脸,“老三和静秋这一对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就像关在笼子里的猩猩,被新世纪的人们轮流参观,参观完后,一边继续享受着现代文明的成果与自由的性生活,一边却意淫着那个时代的纯真。于是,那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自打进入新世纪后,就开始骂骂咧咧,看不惯这也看不惯那,现在好了,终于可以借老三和静秋这一对虚拟的道德偶像,重新占领社会舆论的制高点,至少可以重新自我感觉良好地再欺骗自己一次,找到诸如‘青春无悔’这类屁话的理由——真想问一句:你们有青春吗?”

春树说她会去看电影的,因为“对那个时代感兴趣”,想看看张艺谋在电影里是如何表现的。

网名为“深海水妖”的80后作家陈岚对原著就不“感冒”,“至少三个章节里,是在写自己纯洁得像一张白纸,就像拿破仑后来娶的那个公主妻子,从小养的宠物都是雌性的,纯洁得像个白痴。而且,更要命的地方在于,作者沾沾自喜地把那个男人一再地忍受了性压抑,和她同床共枕,让她帮助他完成手淫后,依然没有碰她的处女膜的高度克制,理解为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也是一种最高纯度的爱情。”

诗人周瑟瑟说:“《山楂树之恋》是史上最干净的爱情,还是史上最不道德的爱情?我只想说:这是一部有洁癖的中国人的情爱史。那段极左生活中的爱情在我今天看来,既是史上最干净的又是史上最不干净的爱情。不幸的是,那样的爱情让今天的名流与中产阶级泪流满面。”

“那个时代典型的意淫”

作为一部知青题材类型的电影,一些人更愿意从时代性的角度批判地看待这部作品。

作家韩东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知青下乡时,韩东大约7岁,知青下乡结束之时,韩东17岁。韩东看过原著,“恶俗不堪……白马王子是个军区司令员的儿子,真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意淫啊,放在今天恐怕就是李嘉诚的儿子了。这书写得一点也不年轻,心理上又老又假正经。”“很可怕。”他说。

禁忌时代的爱情让中年人掀起怀旧热潮

韩东没看过电影,他也不想看,“因为我看过原著,那些(文革)我都经历过,我不喜欢(原著),你看了你就知道了。我没看过电影,对电影没有发言权,由于对原著的不信任,也就不打算去看电影。”

所谓“纯爱”,其实是“假纯”。诗人、评论家刘春说:“关于该片,我就两条,一、女孩子太小,想不纯都不行,还没开窍啊,所以惹人怜爱而非惹人恋爱;二、老三是成功人士,出身好收入高,送得了温暖买得起浪漫,不管什么时代,经济基础都是关键。不信,你把老三换一穷孩子试试。至于白血病之事,我就犯不着说了,老套。”

专栏作家和菜头说:“《山楂树之恋》这种所谓纯爱故事拍出来的纯爱电影,让人始终感觉到欲念涌动,不可遏制,但最终归于自我压抑,显得十分的SM。所以,当年我看到王小波写《黄金时代》,第一段扑面而来就是“破鞋”二字,觉得神清气爽,欲望如同迟到的正义终得伸张,毫无扭曲、压抑、贬损之处。”他还说,“最近两年,我不再像以前一样每片必看了。没有看过的片子有:《梅兰芳》、《三枪拍案惊奇》、《唐山大地震》,准备错过的有《山楂树之恋》。而且,估计也不会去看了。”

文化人杨早也说:“说到纯爱,说到革命时期的爱情,不禁想起王小波那篇小说,王二与女大学生的爱情,那是让我感动的纯爱。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知名媒体人王小山则表示,“没有性爱的爱情算什么爱情?瞎扯淡。”但他会去看的,“看给烂电影树立一个怎样的标杆”。

《山楂树》的编剧尹丽川说:“这就是我对山楂的爱情?我只想说:这是一部有洁癖的中国人的情爱史。那段极左生活中的爱情在我今天看来,既是史上最干净的又是史上最不干净的爱情。不幸的是,那样的爱情让今天的名流与中产阶级泪流满面。”

“禁忌时代的爱情很可贵”

跟上述“讨伐”之声不同,也有“挺张”的。

文化评论人刘仰认为,“80后年轻作家的批评意见认为,没有性的爱情是变态的,还有人认为是邪恶的。这些说法显然过激了。即便在当今性观念最为开放的国家,婚前性行为也不是无所顾忌的。就算双方感情超级浓厚,想把性享受留到婚礼之后,也很正常,谈不上变态或邪恶。何况静秋还是一个在校高中生,让她敞开地把朦胧爱情与性行为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显然不妥。再说,人类历史上还有著名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也从来没有被冠以‘变态’‘邪恶’之类的帽子。”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刘仰还注意到一个现象:爱情中的矫情。“所谓矫情就是想的和说的不一样。这种矫情过去存在,现在也同样存在,但是,两者并不一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矫情主要是来自外部社会环境的压力,口是心非,怕某个结果引发两人之外的反应。因此,这种矫情被动的成分大,从而容易被原谅。而当今的矫情,外部压力少,欲拒还迎、真真假假主要是来自内心的现实权衡:到什么地步可以肢体接触?付出怎样的代价可以亲嘴?什么条件下可以上床?即便上了床,还不知道谁玩谁。因此,当今的矫情是主动的,难以被原谅,只是引人厌恶的造作。”

影评人表江认为,《山楂树》和《三枪》一样,都不是人们期望中的大师作品,它们有事说事,或逗你一乐,或博你两行清泪,两者都完成得很好。“有人说《山楂树》很普通,任何一个年轻导演都能拍出来,恐怕这一点我没法同意,就像我不认为《三枪》是部粗制滥造的作品一样,《三枪》和《山楂树》可能是国内目前能做好的类型片的最高水平,而且重要的是,它不胳肢你,它也没拿人的生理痛苦硬来讨你的眼泪。”

他认为,《山楂树》带给人的感动跟《唐山大地震》很不同,“看《唐山大地震》时我也是哭了的,但是哭完觉得非常难受,情感不是得到宣泄,而是‘被感动’。看《山楂树》我倒没有想到自己会哭,当静秋偷偷将钱放进给她送枣的老三的麻袋时,我默默流泪了。《山楂树》是一部会让你想起过去纯净时代的电影,那些纯净,我们70后可能起上过一个尾巴,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为了别人可以完全无私地克制自己的欲望;无法光明正大的自由恋爱,一样的空间里却因为禁忌而更让人心跳加速的爱情;或者是那种对命运的不安,所谓的档案就是要跟你一辈子的压制……”

无论是褒是贬,面对舆论的高度期许,张艺谋倒是一贯的平常心,他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说,“其实就是我碰到一个感兴趣的题材去拍不同的故事。我没有把自己伟大化,我也不会被大家的议论给说晕了,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

尽管新片《山楂树之恋》并不是很卖座,但只要带上张艺谋这个名字,电影就肯定不缺少话题。9月12日,自称是张艺谋铁杆粉丝的南京草根导演胡鹭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作品《杨梅树之恋》,当天点击量就突破30万。对于这个怀揣导演梦的家伙来说,紧跟乃至“山寨”张艺谋可能是实现自己梦想的唯一渠道。“说实话,像我这样的草根拍出来的作品,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在电影院里放映,唯一的机会就是放到网络上。我也没钱打广告,所以跟张艺谋的电影同步,就当搭个顺风车吧。”

◀胡鹭是张艺谋的铁杆粉丝 快报记者 赵杰 摄

张艺谋拍《三枪拍案惊奇》,他拍《三枪拍案惊奇前传》
张艺谋拍《山楂树之恋》,他拍《杨梅树之恋》

南京有个“山寨”张艺谋

□快报记者 石磊

4个月拍出《杨梅树之恋》

尽管《杨梅树之恋》讲述的也是个爱情故事,但和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相比,胡鹭的作品显得“寒碜”许多。整部电影时长在10分钟左右,只有两个人物——大山和梅子。他们从小青梅竹马,大山考上大学后,因家境贫困一度想撕了录取通知书。为了让心爱的人进入大学,梅子整个夏天都摘杨梅做成酸梅汤到处叫卖,终于帮大山凑足了学费。多年后,大山成了一家城里公司的经理,直到事业失败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他才想起那个善良的梅子。

《杨梅树之恋》从筹划到成片一共经历了4个月,整部电影拍下来一共投入了5万元。有天凌晨3点多,睡不着觉的胡鹭找到摄像师周俊探讨剧本,被周俊爸爸说成“两个神经病”。为了找到合适的取景点,胡鹭租了辆大巴,把10个人的剧组拉到安徽来安县半塔镇。半塔镇是胡鹭9岁之前生活的地方,那里有的人至今还穿着绿球鞋,生活状态几十年未变。

胡鹭笑着说,“当时天气很热,我们住在招待所里,不仅没空调,连洗澡都要排队,因为买不到饮料,最后跑到田里搬了两个西瓜,还被当地农民追着跑。”拍摄条件艰苦。一开始选定的女主角决定“叛逃”,不愿再拍下去了。“当时大家都很着急,还好我们剧组很团结,导演唐佑聪是南艺大三的学生,最后是他找来了女主角。摄像师周俊则把自己的家伙全部都贡献了出来,包括轨道、摇臂、升降机、灯光。”

纯美的爱情永远都在

“工作忙,也许是无奈,在你繁忙中时间也在渐渐地流逝,不要等到爱人、亲人都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有的爱失去了,永远都找不回来了。”这是《杨梅树之恋》片尾打出的字幕,“如果有忙于工作的人看了这部小电影,决定和父母联系一下报声平安,抽点时间陪陪爱人,我觉得就很完美了。”和电影中的大山一样,胡鹭本人也是一个工作狂,为此已经有两个女孩和他分了手。而《杨梅树之恋》教会胡鹭的,就是“关心要趁早”。

9岁那年,胡鹭离开安徽,到淮安读书。由于父母都在南京做生意,淮安只有一个奶奶,因此胡鹭的日子过得很“逍遥”,甚至还偷了奶奶100块钱和同学赌钱。奶奶只好发电报给胡鹭的父母,叫他们领走这个“管不住”的孩子。“偷钱的时候,我想着以后自己赚钱了一定要加倍孝敬奶奶,可是奶奶没等到这天就去世了。如果小时候我不那么顽皮,也许就不会留下这么多遗憾了。”

亲情要珍惜,爱情同样如此。“女孩子总希望男朋友能陪在身边,可我为了拍《杨梅树之恋》,两个月都泡在外面,组团队弄设备选演员。好不容易拍完了,又忙着剪辑,经常我天亮到家里,女朋友都准备出门上班了。”最近,女朋友在和胡鹭闹矛盾,以前遇到类似情况,他总是先把对方晾几天,现在则是立刻道歉认错,把女朋友哄开心。“我觉得应该多珍惜,毕竟一份纯爱来之不易。”

《杨梅树之恋》剧照

这是张艺谋教会胡鹭的。9月16日,他买了张晚上10点35分的票,去电影院看了《山楂树之恋》。偌大的影院里只有15个人,这多少让他有些失望。“可能是放映的时间不对吧,现在不是暑期,看的人自然少了些。”不过,《山楂树之恋》还是勾起了胡鹭一些回忆。

在淮安上学期间,他单恋着隔壁班的女孩。为了能天天看到对方,胡鹭甚至在教室的墙上凿了一个洞,“这样看起来方便,可第二天洞就被老师堵上了。”可惜胡鹭从来没有得到这个女孩的任何回应,直到他转到南京上学。临走前,胡鹭买了点零食送给女孩的弟弟,换来了一张女孩的照片。

“这张照片我一直都留着。”最近,胡鹭终于在同学QQ群里发现了这个女孩,并把照片发给了对方。“女孩看了照片也很感动,她应该想不到有人会一直留着自己的照片。也许有些观众会认为《山楂树之恋》里面的情节有些老套,但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纯爱,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举步维艰的电影梦

拍《杨梅树之恋》的5万元,是胡鹭自己掏出来的,这是他两个多月的收入。用胡鹭的话来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圆自己的导演梦。

胡鹭人生中看的第一部电影是《黄河大侠》,此后对电影一直颇有兴趣,并在1999年加入过北漂大军。“整天在北影门口晃,找机会当群众演员,20元一天。”每一个群众演员都怀着一夜成名的理想,胡鹭也不例外。可在现实面前,这个理想显得过于脆弱。“只要连续几天没活干,就得饿肚子。”胡鹭说,“我会弹吉他,就跑到中国人民大学,给食堂女员工唱唱歌,逗她们开心,吃顿不要钱的饭。我还在一个河南的大棚戏团里表演小品,一个月500块,包吃包住。”

最惨的时候,胡鹭只能睡在北影附近的树林里,当时不少没钱的群众演员都睡那。有天夜里,警察突然来了,睡得迷迷糊糊的胡鹭看见一闪一闪的警灯,爬起来撒腿就跑。后来他才知道,当时没跑掉的人因为拿不出有效证件,被送去昌平挖沙子了,等挣够一张火车票的钱,就被遣返回原籍。

北京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城市,“后来慢慢也就明白了,王宝强真的只有一个。”胡鹭说。

2003年回到南京后,胡鹭卖过格格帽,在酒吧做过舞台总监。5年前,小沈阳曾在南京夜场驻演,身为舞台总监的胡鹭每夜都会看小沈阳演出。小沈阳走红后,他便在各种活动上模仿小沈阳,并加入些南京特色,没想到效果非常好。去年一年,他的收入高达40多万。“我现在主要做大型活动和婚礼的主持,同时也表演些节目。”虽然今年小沈阳没那么火了,但我每个月也能赚两万块。”

“张艺谋不会为难我”

告别了北漂时的窘迫,胡鹭又有点“蠢蠢欲动”了。只不过,他的梦想不再是当演员,而是自己当导演拍电影。这一次,他选择了一个颇为“讨巧”的方法——“山寨”张艺谋。

胡鹭自称是张艺谋的铁杆粉丝,去年他跟着张艺谋《三枪拍案惊奇》拍出了《三枪拍案惊奇前传》,点击率超过两千万次,号称“与《三枪拍案惊奇》的‘票房’差不多”。如今,他又跟着张艺谋拍出了《杨梅树之恋》。虽然《杨梅树之恋》打着向张艺谋致敬的旗号,但胡鹭坦言,“说实话,像我这样的草根拍出来的作品,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在电影院里放映,唯一的机会就是放到网络上。我也没钱打广告,所以跟张艺谋的电影同步,就当搭个顺风车吧。”

靠着张艺谋这座大山,胡鹭获得了更多的关注。《杨梅树之恋》发布首日,网上点击量超过30万,甚至有网友认为,胡鹭用10分钟就解构了张艺谋要花120分钟来讲述的故事。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制造过“馒头血案”的胡戈。因为恶搞电影《无极》,陈凯歌甚至放言要告胡戈。然而,胡鹭却全然不担心张艺谋会为难自己。“去年,我因为拍了《三枪拍案惊奇前传》而和张艺谋见过一面,当时我递给他一张《三枪前传》光碟,他收下了。这一次的《杨梅树之恋》,我不以雷人恶搞为卖点,而是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杨梅树下的爱情故事,想必他不会生气。最重要的是,我相信张艺谋的气量不会那么小。”

“如果有一天张艺谋觉得你不错,想叫你在他的电影里演个角色,你会怎么选择?”面对记者的问题,胡鹭没有任何犹豫,“当然愿意,就算跑个龙套也行。”这一刻,这个曾在北影门口差点被警察带走的家伙完全一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兴奋样,“就因为他是张艺谋。”